耕耘换得花竞秀

——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概述(下)

杨占平

新世纪启动评选“赵树理文学奖”已经20年了，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在当今时代继续高举赵树理的旗帜不过时吗？答案是否定的。赵树理及其作品是不会过时的，赵树理的文学情怀是不会过时的，赵树理的文学道路更是不会过时的。以赵树理为领军人物的“山药蛋派”的核心是人民性，就是面对老百姓，面对普通受众，写农民，为农民写；并且要做农民群众的代言人，为农民群众的利益鼓与呼，让文学作品成为记录人民群众生活历程的载体。特别是对于山西作家而言，赵树理及“山药蛋派”是一种标杆，是一个榜样，也是这次获奖作品的大方向。当然，这也是山西文学的优秀传统，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厚植人民情怀 描绘美好家园

本次散文奖两位获奖者高定存和高海平，都是业余资深散文写作者，对散文的特点把握得非常准确到位，体现了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保德县作家高定存一辈子生活在黄河岸边，对黄河的历史、黄河人的性格、黄河流域的民俗风情，都烂熟于心，因此，他的散文集《祖辈的黄河》以黄河为轴心，描述河中风物，记录河上故事，将极具特色的民风民俗进行系统归类，反应了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语言平实，情真意切，朴素之中透着睿智，精准之中满是情怀，勾勒出一幅斑驳而生动的黄河全景图，展现了黄河儿女的百折不挠与继往开来的奋斗精神。高海平的《太阳很红，小草很青》是标准的散文体作品集，内容丰富，指涉众多，在挖掘描述对象内部幽微的同时，对人物和事物的个性进行了研判和分析，思考深刻，见解独特；在艺术表现上，从自然和社会双重角度切入，有对大自然的深情描述，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两者交融激荡，唤醒了被工业化和现代性叙事语境遮蔽的乡村记忆，以独特的角度重新梳理出逝去生活中暗含的深层价值和意义。

中篇小说是许多小说作家的主打作品，也是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这次获奖的两部中篇小说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大同作家陈年的《归家》，讲述的是因战乱兄妹失散，几十年后一趟寻亲之旅的故事，文字朴素，结构新颖，建构的艺术世界足够丰富；战场上的惨烈、苦难中的救助、亲人间的争议，细腻道来，试图厘清生活中复杂的秩序；作品肯定了看似普通的人生中蕴藏着的可贵品质，表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作者陈年一直致力于中篇小说写作，这次获奖，进一步证明了她的实力。另一部获奖作品是朔州作家马举的《蹚不过的马家河》，小说书写主人公马二娃与母亲、嫂嫂、侄子、养女等各色人等的复杂关系，众生芸芸，女人以其宽厚和仁爱情怀扶持着男人，男人以其勤劳和宽厚能力成全着女人；在尘世的长河中，有多少如果，就有多少遗憾；马家河一辈一辈老人下世，一辈一辈新人冒出，他们怀着梦想迁徙到城市各处，孕育着新的希望，中篇小说的特有意义得到了充分发扬。

更新创作理念 契合审美需求

人们对文学的需要什么时候都不会停止，停止的是一些固步自封的作家和过时的作品，其创作经验和理念停滞不前。在这方面，儿童文学是最好的证明。这次获得儿童文学奖的两部作品，就是特别适合不同读者阅读的。

王琦的《小城槐香》，延续了她此前已经获得过“赵树理文学奖”的《小城流年》的风格，构思完整，语言朴素，叙述唯美；故事时而舒缓，时而激昂，有着生长的动感与旋律，从孩子细腻的心思出发，将自我的经历与四季的刻画诗样结合，简单的忧伤与欢腾蕴含着成长的趣味与长大的思考，是一部有温度、有亮度的作品，并且传达了古城太原的地域文化韵味。侯建臣的《点点白的俏鞋子》是一部寄寓成长之思的长篇童话，作品以虚拟的形象与开阔的想象，承载了光明战胜黑暗、于困境中历经考验，并最终达成心灵成长的主题意蕴，具有童心关怀的情感温度与趣味，在“幻想”与“故事”之余，以一幅互帮互助的群像，指向了人性中始终应当追寻的真、善、美。

甘于辛劳奉献 扶持文学新秀

“赵树理文学奖”中有两个奖项是全国同类评奖中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优秀编辑奖”和“文学新人奖”。一部好作品的出版，离不开一位优秀编辑幕后耕耘，许多好作品如果没有优秀编辑的慧眼识珠和细心修改，也许会埋没。用人们经常的比喻语言说，编辑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设立优秀编辑奖，对于繁荣文学事业、促进文学创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举措，更是对奉献多年的文学编辑的认可，在全省以至全国文学界都广受好评。设立文学新人奖的目的更为明确，那就是要促使山西文学界新人辈出，体现后继有人的态势，为更多的文学新人鼓劲儿、树立目标。

获得优秀编辑奖的是《晋中日报》副刊编辑郝俊丽和太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都市》杂志资深编辑贾健民。评委会给予郝俊丽的评语说：“她对待基层作者真诚友善，致力于发掘本土文学新人，倾情为文学爱好者服务，扶持和帮助了一大批文学人才。”给予贾健民的评语说：“他编辑发表的诗歌作品，许多入选知名选刊、重要选本，他用自己的劳作，成就着一批诗坛作者；他以一名资深文学编辑的情怀与姿态，汇入了山西文学的诗和远方。”这两个评语是比较精准的，事实上，也是对众多默默无闻的文学编辑的鼓励。

文学新人奖获得者之一张琳，已经从事诗歌创作近20年，她具有女性诗人天生的“母性情怀”，大量地、反复地在作品中抒写永远的主题“爱”，强劲地扩张了这个概念的力量与含义；她对平凡生活的礼赞，对美的抒情，也带有诗人浪漫主义的追求；而她诗歌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则是把细微的感知力和灵巧的顿悟，穿行在字里行间，带有一种发现的、赞赏的、心领神会的精神愉悦。另一位文学新人奖获得者朱伊文，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文学专业人员，不光在本职工作领域颇有建树，并且把写作视角伸向影视剧、歌词、人物传记、散文等多个领域，勤奋写作，成果显著；她始终立足山西这片沃土，善于汲取古典文学精粹，关注现实生活走向，致力于以一种超越以往的视角、事例对比的手法和多方反思的方式，审视故土故人，重新阐释山西历史文化的价值，探索新时代下三晋文化现代性的表达。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能够安静地、投入地从事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高尚的文学一定会在岁月中闪耀出不灭的光芒，能够在写作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探索，这将是获奖者今后努力的目标。

双塔

网络文艺评论更要精短鲜活

欧阳友权

恰当的表达方式是增强网络文艺评论有效性的技术策略。网络文艺评论的语态修辞、传播渠道、影响路径和方法形态都应该兼顾“网络”的特点，适应网络时代趣缘化阅读、点赞、转发、短评等接受和传播方式，以发挥评论的最大效能。

网络文艺评论的表达有几种常见技术策略：

“短”，即评论的篇幅构型宜短不宜长，行文时开门见山，不铺陈、不敷衍，讲究言简意赅、直击要害、注重导向、追求质量、宁缺毋滥。短小精悍的评论一方面有利于自媒体传播，同时也适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文化消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活动，将500字以内的微评纳入优选范围，单独设置“短评”和“微评”类型，正是对精短评论的积极倡导。

“新”，网络文艺本身就是新的文艺类型，评论者应该使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选择新的角度和新的表达方式，写出不落窠臼、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评论。

“美”，好的评论文章应是一篇美文，阅读评论是一种审美体验，忌讳把评论写成八股老调、高头讲章，应通过鲜活生动的语言，表达丰富深邃的思想，以感染力和说服力让读者在审美中收获启迪。

思接千载 心游万仞

——《上河记》的记叙特色

俞耕耘

李敬泽把河上纪行写出了纪录片的文献感，他像周代的采诗官，取各国之风，用以兴观。若以六经皆史的观念看，河上民风，自是春秋。《上河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虽为游记，实为文化考古，它从现场观察，即时感受，生发“自我叙事”、历史引类。这是评论家的当行本色，带着年鉴学派注重微琐，看重生活史、物质史的叙述气质。

“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换言之，被看到与被记述，感知与经历的黄河，绝非一回事。李敬泽描述了熟悉的陌生、博学的无知。这是以退为进，用防御性的自我评论，展示对大河流动不居、浩大繁复的敬畏。

推理叙述是一名作家的素养，那里生发着揣测、想象与图景。考古者、侦探和作家，往往又有共通原型，即猜谜者、复盘者和讲故事的人。

李敬泽经营文章，汇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献，叙事写人，描情状景，构成文体综合实践新境界。在我看来，其文章亦由“故事的图层”反复叠合而成，如同古典罩染画法。人物故事、自我故事、历史记载来回穿引，构成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譬如他借陕北旅途所读《中国绅士》为楔子，套嵌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对前途命运的杂感。

《上河记》书影

“后来，‘地主’‘贫农’都不用填了，只需填上‘干部’。这很好，我不必再为此焦虑……当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打倒了地主我母亲肯定上不了大学，那么她生下的肯定不是我。”作家考辨地主与绅士之别，又颇有鲁迅之风。他以才学见于随笔，显露的是历史的识见、解释学的兴趣。如引证顾颉刚《甘青闻见记》，对“卦婆子”也作了源流考。

李敬泽夹带叙事、勾勒写人的功夫，如微小说，三言两语，就是微澜情节。当“我”沾了光，蹭了旅行团的导游讲解，还不忘琢磨：“他们认为仅仅两个洋人就享受一名导游的服务，这不公平。我看着我们那位年轻的讲解者，只见他脸上淡漠如水，说了句‘他们交的钱多’。”之后是安静，“显然那五六十秒的安静是在向更多的钱致敬”。这种旁观的反讽，生于沉默和顿悟的时刻。

当记忆出现空虚，无法按图索骥时，知识就开始登场。他的写作显出记忆和知识的共同体，其间有微妙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我知道的比我记得的更多。”在唐卡、经卷、酥油和奶香的感官回忆外，他开始转向资料。

福柯曾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论述了“图形文”的观念。我想，李敬泽穿插征引文献，同样也是图像和文献的并置、对证和相互指涉。他善于打通来历出处与“即时即景”，民风礼俗之画，也成了思想风景。同时，这种知识也客观拉开叙述的空间与时态。事实上，作家只是游历后知晓，于写作的“此在”中，整合、查阅并回望。

一叶知秋是洞察力，社会关切是介入感，逻辑推导则是不少作家欠缺的思维训练。李敬泽将关切他人与关心自己同构一体，这是一种双重观照的写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经纬，一种纵横气莽莽而来。过去未来时与将来进行时一并穿行，又何止远上白云。《上河记》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来，思绪落笔，远比河道更自由。

右玉精神与本真写作融合

郭 虎

这些年，反映右玉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还有以新闻报道形式构成的庞大的宣传体量，虽千人有千种写法，却往往大同小异。我一直想展现更接地气、有血有肉的右玉精神，于是我想到了报告文学的表现形式。

正如我在《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谱》(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后记里写到：“我是右玉县威远堡人，生于斯，长于斯，也将终于斯。从直观的角度来看，右玉的深刻变化一点一滴慢慢叠加在我的眼球里，深深烙进我的心灵里。事实上，我也是右玉绿化大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从小学到参加工作，经我用过的铁锹，磨坏的都有好几把了。年年植树，年年绿化，这是作为一名右玉人无法推卸的一种义务。”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义务令我寝食难安，那就是为右玉那些默默无闻的造林功臣们作传，作一部铿锵有力的大传。

庾信是北周时期的诗人，他在一首诗里说：“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后人把这句诗简化了，变作“饮水思源”。说到右玉的绿化，就不能不从张荣怀说起，张荣怀就是右玉精神的缘起。当然，说完张荣怀，还有王矩坤，还有马禄元，还有庞汉杰，还有常禄、高厚、赵向东、王占峰、韩祥、张一、伊小秀、毛永宽等等……这些名字无论哪一个，在我心里都是伟岸的，都是高山仰止的，都是重若千钧的，他们如杀虎口的明长城一样，长久伫立于我需仰望的正前方，让我一次次肃穆地重温一段段风沙弥漫的旧时光。

可以说，先期的采访并不顺利，一些人生活在我阅历之外，一些人年事已高对往事缺乏连贯性的记忆，一些人甚至不愿触碰那段艰难过往。但我必须从历史的长河里耐心地挖掘出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与泠然作响的鲜活事例。我不敢轻易拔高或随意贬低他们哪怕一丝一毫的形象修为，我深知杜撰来的情节终究熬不过历史的澄鉴与甄别，我只能学习古人最笨的方法——行万里路，访万千人，阅万卷书。我力图把最真实、最生动的普通劳动者和县委书记们写出呼吸来，写出味道来，写出立体感来。

我以为，报告文学的立足点应该是基于一个客观的立场，并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整个人物或事件的走向，冷静看待所要反映的人和事，不能有丝毫偏向性色彩包含在文字当中。既要客观，又要公正，还要人情味与艺术味相得益彰。

我以为，报告文学的形象性源于语言的平实和厚朴，把人物形象立起来，必须用直白的语言反应出人物的个性，如果缺失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那么写出来的人物就会千人一面，没有特色，读者就不会留下深刻印象。

我以为，报告文学写作离不开情感的真笃，离不开落笔的沉实浑劲，更离不开与人物的共相唇齿。

由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张荣怀，想象成了王矩坤，也想象成了张一和毛永宽。当我穿越回那个艰苦朴素的年代，并设身处地地成为那些平凡英雄的时候，我感受到常人无法承受的力尽筋疲与艰难竭蹶，曲折和压力如同大山一样横亘在眼前，不要说让整个右玉大地布满绿树了，即使在茫茫沙海里栽活一棵树，都觉得难于上青天。但是，我笔下的主人公们，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凭着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荫的执著，以最质朴、最笨拙的、甚至有点类似蚂蚁搬家的工作方法，一点一点改变着右玉的生态与气候，改变着右玉人的生活与命运，这是何等的艰苦卓绝又可歌可泣啊！

报告文学的在场意识与本真写作是我一贯追求的创作风格，而对文本的结构性设置则取决于人物的外在气场与内在精神所蕴含的深度。我习惯于做多层次调研与沉浸式构思，无论人物选择、事件复盘，还是细节的推敲与重塑，均建立在朴素与率真的基础之上，在尊重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我沉迷于人物事件中难以自拔。以《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谱》为例，每写完一个章节，每记录完一位植树功臣，我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能从那个人、那件事中走出来，以致于我循蹈那个人的足迹在真实的环境里总要痴迷很久。事实上，对既成文本的修改与润色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总体感觉还是受益匪浅。

右玉人的造林运动坚持了70多年，在70多年悠长的时间里，涌现出数不清的植树模范，从繁如星辰的先进人物中遴选出适合书写的主人公，确实比较困难。但右玉的客观情况又比较特殊，每一次造林所呈现的特征都倾向于大兵团作战，而这样的近乎全民参与的运动，往往考验的是地方领导者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和长远发展的规划能力。右玉精神之所以通过不断延续并逐渐成型，右玉县的县委书记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不能因有为当政者树碑立传之嫌而放弃客观事实的正确描述。当然，我还是特别注重把更多的笔墨分配给更加平凡的人，诸如威远堡的毛永宽、南崔家窑的余晓兰、石砲沟的王占峰，还有水磨沟的韩祥、栽了一辈子树的尹小秀等等。这样，我就更有底气把这本报告文学做成一册《右玉精神英雄谱》，在历史的风云中让英雄们逐一亮相。

漫漫创作路 行则将至

刘 恒

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小说，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物种”。这个比喻不恰当，也并非完全不恰当，我只使用貌似恰当的那一部分。小说穿越语言的丛林进化而来，由部落篝火边零碎的呓语，膨胀到如今大江大海般的规模，其内核与样貌演进之巨，跟猴子变成了人差不多。

因此，小说是有祖宗的。无论其优劣美丑、智愚壮弱，必有基因可循。辉煌的小说恍若横空出世，骨子里却是基因搭配和天然调试的结果。丛林险恶，无名之辈尸横遍野。只有搭配适宜、调试均衡的幸存者，才能凭借强大的基因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那些长生不老的小说，是一册又一册语林豪杰的纪念碑。

想当初，第一批猴子从树上爬下来，怀着恐惧和饥饿感奔向远方。留在树上的猴子还是猴子，远行者竟然变成了人。直立、工具、火……促成变化的条件很多，但有一个条件至关重要，那些勇敢的猴子不仅开拓了食物的边界，还幸运地融合了新鲜而陌生的基因。猴子和猴子的差别，最终转化成猴子和人的差别，无非是前者下不了树，后者下了树而已。古今中外的小说，其演化的逻辑也无不如此。具备一般阅读经验的人都有能力认定，有些小说仍旧攀在树上自娱自乐，另有一些小说已经斗胆落地并走了出去，且走得很远很远了。

我的本意是，小说需要不断地学习，其本质与虚荣无关。学习是为了生存！知识的远端融合固然有益于智力的繁殖，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产出新的生存技能，以适应复杂环境。经常听见有人夸张地哀鸣：小说死了。那么，它是怎么死的呢？语言癌变？落入人工智能的圈套？出门迎头碰上飞奔的互联网？或是自恋过甚发了疯？文绉绉的说法应该是：小说在残酷的信息爆炸的竞争环境中逐渐丧失了生存技能。

小说没死，活得不痛快却是真的。不过，活得再不痛快也别回到树上去，那会让你更不痛快，而且十二万分丢人。那么怎么办呢？学习！向祖先学习！向近在眼前以及远在天边的聪明的家伙们学习！信息爆炸的困境是有限的，因为语言的丛林像宇宙一样漫无边际。在我看来，文字就是麦子，是水，是氧气……毫无疑问，石头能削出斧子和镰刀，木头能钻出火来，绳子疙瘩能化为文字，小说也必能长出翅膀，在未来的天空翱翔。

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人以及更年轻的人，寄希望于崭新的光彩夺目的波浪一样不断涌现的智力成果。我们将为此而骄傲。但是，我们不能过度骄傲。我们不能成为智识领域的种族主义者，不可蔑视观念不同、流派不同、水准不同而同在地上行走、同在纸上书写的兄弟姐妹们。哪怕有的家伙真的返祖爬回树上去了，也应报以真挚的同情和适度的劝慰。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物种的整体进化，当然也是人间常态和知识界的常识。

在海量信息围困之中，静心书写是一种突围，静心阅读也是。在小说这面朴素的文学旗帜之下，各路勇士们将提供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证明，而各类看客也将为这种精神领域的搏斗给出评判。我期待文章内外的人彼此坦诚凝视，透过文字领略独孤之笔滴落的心血，以及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目光里流淌的心声。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⑥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